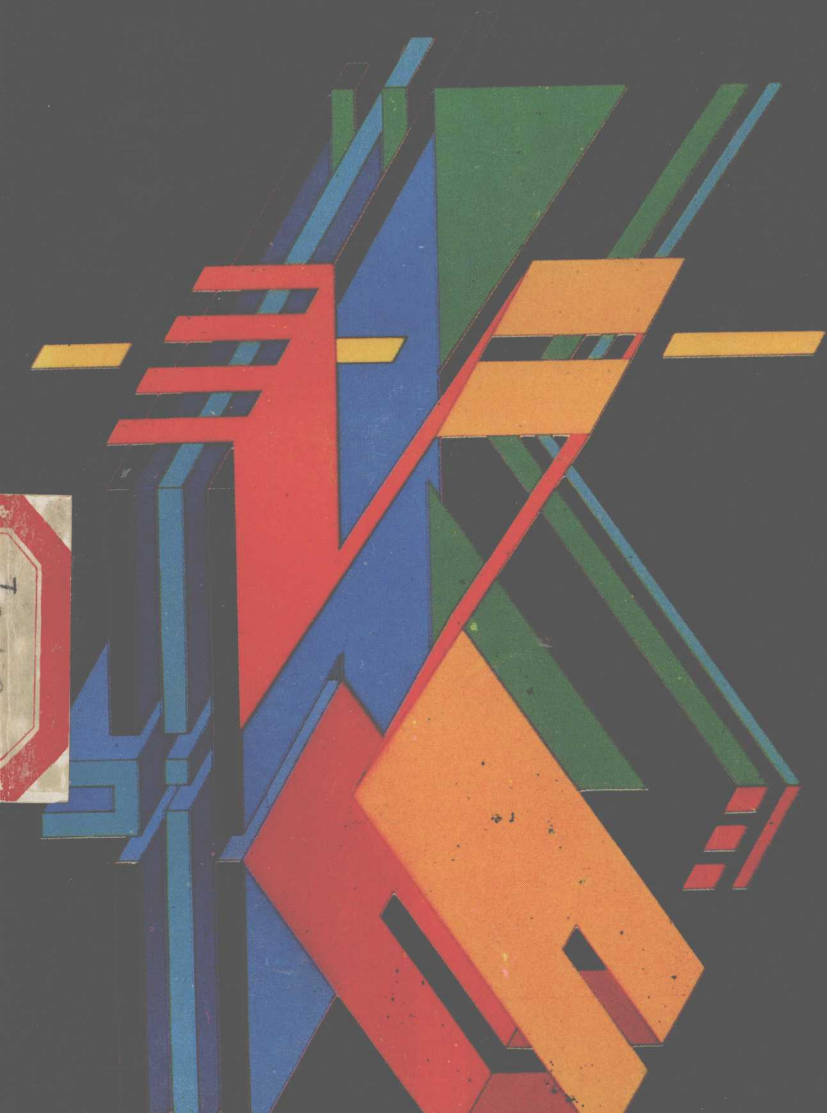


新時期文學縱論

顧 驤 著

時代文藝出版社



I 206.7
136 ✓

新時期文學縱論

顧 驤 著

現代文藝出版社

(吉)新登字05号

新时期文学纵论 XINSHIQIWENXUEZONGLUN

顾骧 著

责任编辑：胡卓识

封面设计：章桂征

时代文艺出版社出版
(长春市斯大林大街副136号)

850×1168毫米32开本

6.5印张

3 插页

140 000字

通辽教育印刷厂印刷

1992年7月第1版 1992年7月第1次印刷

吉林省新华书店发行

印数：1 500册

定价：4.40元



顾 骧 江苏省人。文学评论家，研究员。中国人民大学哲学系研究生班毕业。解放战争时期在华中解放区参加革命。在江苏淮阴、无锡、南京和北京的文工团、报社、杂志社、出版社任团员、编辑，在中央高等艺术院校教书。六十年代中期以前，主要从事哲学、美学的教学与研究；“文革”后，主要从事文学研究和评论，间有散文写作。除有哲学论著出版外，著有《顾骧文学评论选》、《新时期小说论》（合著）。主编《周扬近作》选，《女作家成名作丛书》、《作品争鸣丛书》等。

目 录

兰叶春葳蕤

——读周扬同志近两年来的文艺论评…………… (1)

当代知识分子的心声

——《周扬近作》编后札记…………… (15)

关于文学中人民性的思考…………… (26)

现实主义在更高层次上的回归

——就文学发展态势问题答《作家生活报》

记者问…………… (32)

从人的自觉到文的自觉

——《新时期文学荟萃》序…………… (46)

文学人性十年…………… (50)

万马蹄如骤雨来

——报告文学新浪潮的态势及其意义…………… (63)

群众需要健康的通俗文学…………… (71)

从纪实文学大潮看传记文学…………… (75)

西部文学：西部作家的个性追求…………… (77)

愿“绿叶”成荫子满枝

——贺“绿叶”文学奖揭晓…………… (82)

人间要史诗

——写在第二届茅盾文学奖揭晓之际·····	(85)
读长篇小说漫笔	
——写在第三届茅盾文学奖揭晓之际·····	(89)
“其中有着时代的眉目”	
——读《湖滨拾翠》·····	(99)
历史的沉思	
——读长篇小说《过渡年代》·····	(102)
润物细无声	
——读《江村》·····	(105)
形散神凝 自然隽永	
——读汪曾祺的《桥边小说三篇》有感·····	(108)
平芜尽处是春山	
——读长篇小说《古塔上的风铃》·····	(112)
不问鬼神问苍生	
——读长篇小说《苍生》·····	(115)
追寻改革文学的长久生命力	
——读长篇小说《骚动之秋》·····	(121)
回眸“第三的世界”·····	(125)
西藏情思	
读《绿雪》·····	(128)
弥天风雨作龙吟	
——读《风人诗草》·····	(130)
十年一觉	
——《爱神与邪魔》序·····	(132)
开一代诗风	
——《乌鲁木齐诗话》序·····	(135)

轻帆柔橹忆江南

——《钱国丹小说选》序 (138)

王宏烈著《囚徒》序 (140)

“半瓣花上说人情”

——《项东校园散文》序 (142)

树立科学的学风和文风

——在《理论与批评》编辑部座谈会
上的发言 (145)

对当前文学批评的思索

——在《文学自由谈》编辑部座谈会
上的发言 (148)

社会主义文学方向的一致性与艺术多样性的统一

——答《理论与创作》编者问 (151)

正视非社会化文学思潮的存在

——在《文艺报》座谈会上的发言 (156)

她是她们的知音

——读李子云的“当代女作家论” (160)

和孩子们一起看《好伙伴之歌》 (164)

到生活的深处去淘金

——看《金子》 (167)

可贵的探索

——关于《绝对信号》的信 (172)

史笔·哲理·诗情

——《吴王金戈越王剑》散论 (176)

话剧舞台上的现实主义艺术力量

——浅谈“狗儿爷”的典型意义	(182)
疏影横斜 暗香浮动	
我看话剧《天下第一楼》	(187)
与变革时代的现实生活紧密结合	
——看话剧《惑》	(191)
“戏魂国粹”	
——岁末看《茶馆》	(194)
中华民族源远流长的歌	
——电视系列片《话说运河》散论	(196)
一曲人性的哀歌	
——看《湘女萧萧》	(200)
这如诗如梦的年华	
——看电影《多梦时节》	(202)

兰叶春葳蕤

——读周扬同志近两年来的文艺论评

作为我们党的杰出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思想家的周扬同志，在文化战线上生活和战斗已经半个多世纪了。周扬同志在哲学、社会科学多方面有着深湛的研究与建树，而尤以文艺理论更为卓著。早在三十年代初，他就在《关于社会主义的现实主义与革命的浪漫主义》一文中，把当时苏联文艺界正在讨论与提倡的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理论第一次介绍到中国来，对中国革命文艺理论的建设起了十分重要的作用。四十年代，他编选出版了《马克思主义与文艺》一书，比较系统地介绍了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基本原理。这本书曾得到毛泽东同志热情的赞扬与肯定。对文艺界的理论建设，影响深远。建国后，周扬同志在文艺理论上自有其杰出贡献，同时，毋庸讳言，也有失误之处。是非功过，需要历史地说明，才能科学地给以评价。在党的政治生活比较正常的健康氛围下，则易显其思想上的睿智与理论上的卓识。比如，在党的第八次代表大会后早春天气的1957年4月，他《就“百花齐放，百家争鸣”问题答〈文汇报〉记者问》，便是一篇正确总结文艺战线新情况、新问题、新经验，科学地阐述党的文艺方针的精彩之作。1960年冬开始，党中央对“左”的经济、政治、文化政策作某些调整，文艺界曾一度思想活跃。他主持撰写的纪念《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

话》发表二十周年的《人民日报》社论《为最广大的人民群众服务》，对于科学地认识文艺与政治的关系，应该说向前跃进了一大步。社论将文艺“为政治服务”，扩展成“为以工农兵为主体的全体人民服务”，是对《讲话》的丰富和发展。五十年代后期，毛泽东同志在社会主义社会阶级斗争的理论和实践上扩大化、绝对化的错误，以及个人专断的作风，发展得越来越严重；我们党的工作在取得伟大成就的同时，在指导方针上也有严重失误。处于文化战线领导岗位上的周扬同志，自难置身事外。他也曾执行过某些“左”的政策，宣传过某些“左”的理论。这里固然有他应负的责任；但，若检读周扬同志这一时期的全部言论，不难发现周扬同志的隐衷。且不妨去翻翻“文革”中红卫兵编的“黑话录”之类，个中透露了周扬同志许多未构成正式文献的言论，对“左”的思潮和理论，有过多么剴切的批评与抵制啊！从这些材料中，可以窥见在党的民主集中制原则受到损害，政治生活不正常的情况下，他的矛盾心情与一个理论工作者的艰难。惟其如此，才在延续十年的大动乱方始之时，他就被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诬陷为“修正主义分子”，用以为那场给国家与人民带来无穷灾难的政治大风暴祭刀。十年内乱，九载楚囚。救平林江之乱后复出的周扬同志，已霜满两鬓，垂垂老矣。然而，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党中央建立起马克思主义的正确领导，我们党获得了新的更加强大的生机和活力。社会安定，政通人和，世道清明。此时，周扬同志重新焕发了青春。他仍然才思敏锐，谈锋刚健，豪情不减当年。几年来，他一直站在时代潮流的前列。1979年春天，他所作的第三次思想解放运动的讲演，对于起自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讨论，而为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所倡导的思想解放运动的伟大意义与历史地位，作了高度的评价与科学的论证。他认为

这是继“五四”运动与延安整风之后，我国现代史上的第三次思想解放运动，一次新的马克思主义教育运动。同年秋，他在全国文学艺术工作者第四次代表大会上所作的主旨报告，高屋建瓴，鸟瞰一百多年的社会主义文艺史，总结三十年的文艺经验，对如何处理好关系着社会主义文艺盛衰成败的文艺和政治、文艺和人民生活、文艺上继承和革新三个关系，作了科学的论述，提出了新时期文艺的战斗任务。五年时间过去了，实践证明报告的基本观点是站得住脚的。四次文代会在当代文艺史上具有划时期的意义，它确是一次承前启后、继往开来的盛会。

复出后的周扬同志，给人印象的一个显著特点，是他对历史经验的重视。恩格斯认为，马克思主义者“比任何一个哲学学派，甚至比黑格尔，都更重视历史”。在社会主义历史新时期，周扬同志的文艺论评，始终贯串着对历史经验的探索。力图从历史经验中找出规律，以指导未来。他从自己半个世纪的亲身体验中，深刻感受到“左”倾思潮在文艺领域根深蒂固，源远流长。他为诊治这痼疾顽症而不遗余力。

复出后的周扬同志给人印象的另一个显著特点，是他客观地、公正地对待历史的态度。经过十年动乱，历史上的的是是非非看得比较清楚了。周扬同志经常公开地，对“十七年”中的某些错误，坦然进行自我剖析。同时，对于在“十七年”中因与他工作有关而遭受不公正对待、蒙受冤屈的同志，总是诚恳地、不厌其烦地一再表示歉意。他不文过饰非，不上推下卸。这种坦白襟怀，磊落气度，赢得了人们的尊敬。我以为，这不仅仅是一个品德修养问题，也是一个马克思主义者的科学态度问题。1983年春节期间，他在天津市一次讲话中说：“自由是对必然的认识。社会主义文学是自由文学。我们就是认识客观

世界，谁认识得正确，认识得深刻，谁就掌握真理多，犯错误少。我们这些人就是在犯错误中走过来的，不要掩盖这一点。错误有什么可怕呢？人类历史就是在错误当中前进的。所以说，不敢讲自己的错误，回避自己的错误，本身就是非马克思主义的态度，反马克思主义的态度。”

复出后的周扬同志给人印象的再一个显著特点，是他在理论上的勇气，在政治风浪中的骨气。周扬同志按照共产党人的党性原则，敢于突破理论上的禁区，以无畏的气概，追逐真理。社会主义新时期的文坛，并非是风平浪静的。在文艺上几次反复中，周扬同志一身正气，决不见风转舵，随风摇摆。表现了一个马克思主义者的原则坚定性。这是理论工作者最可宝贵的品格，是足资我们学习的楷模。

从1983年以来，周扬同志身体欠佳，常因病住院治疗。但他并未为病魔所压倒，在艰难的境况下，仍勉力为公，为社会主义文艺事业不疲倦地奋斗，发表了一系列文章与讲话，对许多文艺问题进行了评述。最近，胡耀邦同志对文艺界提出“大鼓劲，大团结，大繁荣”的号召。这是从文艺战线的实际出发，符合社会主义文艺发展规律，深得人心的号召。我觉得，周扬同志这两年的文艺论评，是与耀邦同志号召的精神相一致的。

—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结束了“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时代，把工作重心转移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轨道上来，这是我们党建国以来最重要的历史转折。文艺工作不应游离于四化建设这个中心，更不应背离这个中心。我们文艺工作的总口号是“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也就是要为四化建设服务，就

是要致力于文艺的繁荣。“破”字当头，无休止地进行“大批判”，弄得林暗卉殚，与文艺工作总任务不合。针对历史的教训，周扬同志鲜明地提出“文艺也是服务性行业”的命题。他说，“我们平常一讲到服务行业，常常多少带一点看不起的味道。实际上，我们文艺界也是个服务行业。没有理由看不起服务行业。我们社会主义的文艺，就是纯粹为人民服务的，是为他们服务的。”

要使文艺为四化建设的人民服务得更好，要使文艺繁荣，文艺生产力发展，最重要的是调动广大文艺工作者的社会主义积极性。靠什么调动文艺工作者的社会主义积极性？靠“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方向下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这个党的基本方针。要发扬文艺民主，艺术自由。这是周扬同志在总结历史经验中所得出的规律性认识，是他数年来所反复强调的基本观点。他在学习和贯彻党的十二大精神问题的讲话中，对于这一点，说得很清楚：

“社会主义文艺事业是广大人民群众的事业，不动动人民的积极性是什么也办不成、办不好的。我们的农业战线之所以取得迅速的极大的成就，在于各种形式的生产责任制调动了广大农民的积极性。要开创社会主义文艺的新局面，就在于善于调动文艺工作者（包括专业和业余）的积极性，并把这种积极性引导到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的方向去。

“……‘双百’方针是我们党发展学术文化的坚定不移的方针，是在承认社会主义社会仍然存在着各种矛盾的基础上提出来的，是我们长期的根本的方针，对于这个方针不要有任何怀疑和动摇。一方面，我们要提高文艺工作者对人民的责任感，他如果放弃了这种责任，就不是人民的文艺工作者和社会主义的文艺工作者了。另一方面，我们主张领导机关要保证文艺工作者在创作上、特别是艺术上的必要自由。社会主义国家，人

民掌了权，如不保证创作必要的自由，谁来保证？文艺工作有它自己的特点和规律，限制得太死或强求一律是不行的。一定要保证必要的自由，必不可少的自由，这不是自由化。……所以创作上特别是艺术风格上是应该给予必要的自由的，作家、艺术家完全可以根据自己的特长、风格进行自己的艺术创造。我们说保证作家的权益，这就是最大的权益。……你不多样也不可能。要允许多种颜色。毛主席讲过，世界就是多样的统一。所以在艺术问题上应该宽一点，同中央保持一致是指在政治上，在大的方向、方针政策方面，而在学术、艺术问题上要给予充分自由。这并不是自由化。毫无疑问，‘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我们是要坚持的，这是个被实践证明了的正确方针，是最受广大文艺工作者欢迎的方针。”

在首届茅盾文学奖授奖大会上的讲话中，他又讲了如何贯彻“双百”方针的意见：“贯彻双百方针，要鼓励两个自由：一个是充分讨论的自由，一个是艺术的形式和风格发展的自由。学术上的问题，艺术上的问题，无论正确的还是错误的，都应该允许自由讨论，这就是百家争鸣。艺术形式和风格越多样越好，这就是百花齐放。”“对艺术上的问题，只要不涉及政治上重大原则的问题，应当有更多的自由讨论，不一定急于做结论，这对于文学艺术的发展是有利的。”同年，他在郭沫若研究学术座谈会上，还从学会领导和组织精神文明建设的高度，讲“百家争鸣”的重要。他说：“文化事业同整个革命事业一样，要走自己的路，要把马克思主义同中国实际相结合，建设具有中国特点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我认为这是我国文化工作的总方针，总的奋斗目标。学会建设这种文明，学会领导和组织这一精神文明建设，需要一个过程。文明、文化是不能靠强迫命令建立起来的，它需要发挥每一个人的创造性，需要

经过群众性的讨论研究。”他在参加《文心雕龙》学会成立大会期间谈话时指出：“学术发展，学术提高，只有通过开展自由讨论，自由争论，没有别的办法。当然，要鼓励个人的研究。但个人的研究成果也只有通过讨论才能看出来，才能为大家所注意。”

在1983年全国优秀短篇小说评奖授奖大会上，周扬同志在讲话中着重讲了作家、艺术家需要有“真正艺术家的勇气”问题。他设问：“为什么要提出‘真正艺术家的勇气’的问题呢？”

“我们的作家、艺术家不是没有这种勇气，而是还不普遍，有些人勇气还不足，不足在伟大的历史新时期，象恩格斯称赞巴尔扎克那样‘对现实关系具有深刻的理解’，在富有诗意的描写中表现出‘多么了不起的革命辩证法’！”“‘真正艺术家的勇气’是很可宝贵的，很不容易做到的。它是一种积极性，一种属于作家、艺术家特有的创造性和积极性。这样的积极性，我们当然要保护，不能挫伤。我们的国家这么大，我们的国家正在进行着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这么伟大的事业，全国人民励精图治，奋发图强，全国到处热气腾腾，人才辈出。要表现这样的时代与新的群众，要表现我们社会的本质方面，要不回避社会矛盾，反映尖锐重大的斗争，没有创造性和积极性，没有‘真正艺术家的勇气’是不行的。……我觉得，调动社会主义积极性，是发展生产工作、经济工作、文化工作的关键问题。现在我们的文艺工作要有新的成就，就要继续调动这种积极性。要调动积极性，不调动积极性什么事情也做不起来，这是明显的道理。调动积极性的过程中即使一些错误的东西出来了，也是不难克服的，也比没有积极性好。”我们知道，要有“真正艺术家的勇气”这句话，是恩格斯不止一次说过的，但是在1984年5月重新提起是十分适时的。周扬同志的讲话使人心为之一

振。讲这样的话，也反映了周扬同志自己所具有的“真正艺术家的勇气”。

二

在文艺领域，要实现党对文艺工作者的正确领导，就要正确处理党和文艺工作者、也就是和文艺界知识分子的关系。我们党内过去长期存在“左”的思想，一个重要表现是轻视文化知识，轻视、歧视知识分子，因而严重影响了我国社会主义的物质文明建设与精神文明建设。文艺的新时期，包括近两年，周扬同志的文艺论评，反复强调发展社会主义文艺必须坚决依靠广大文艺工作者，必须团结广大文艺工作者，充分发挥文艺界知识分子的作用。他大声疾呼，要重视人才，发现人才，培养人才，爱护人才。他说：“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不仅要有物质投资，还要有人才投资。这就要求我们把眼光放远一点，要爱惜人才，重视知识分子在精神文明和物质文明建设中的作用。增加必要的文化设施，广开学路，广开文路，广开才路。由于长期“左”的影响，我们对人才是不够重视的，不要说‘四人帮’时期，就是在开国后十七年，我们对爱惜人才这一点也注意得很不够。搞的运动太多，时常混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耽误了不少人才。我们要爱惜人，关心人，过去我们也批评过人道主义、人性论，有的带有很大片面性，有的批评错了的。我们要提倡用科学的历史唯物主义观点阐明人性论和人道主义，不应不加分析一概反对或轻视。唯物主义的人性论、无产阶级的人道主义总不应该不讲。而且要尊重人，尊重人的尊严。中国的传统道德认为‘士可杀不可辱’。古代的‘士’就是知识分子。封建社会尚且知道应该重视知识分子，我们今天提出

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必须总结过去的经验教训，正确对待解决好知识分子的问题。”“党的三中全会以来，关于知识分子的政策，正在逐渐落实；他们的工作条件有的已有所改善。但做得还不够，还有许多问题仍然没有解决。现在还有人认为不要知识也照样能革命，这是一种非常错误的观点。……要反对形形色色敌视和蔑视知识分子，轻视科学文化，为愚昧辩护，鼓吹落后的错误论调。”1983年1月，周扬同志与人才研究会的负责同志谈话时说：“现在各方面都开始重视人才，这是好事。然而，宋朝王安石说过：‘人才难得亦难知’。不仅发现人才不容易，了解人才也很难。因为任何人才既有长处，同时也有毛病。没有缺点的人才几乎是没有的。人才的优点与缺点常常交织在一起，如果专挑他的毛病，可以挑出很多。所以说求全责备就难以发现人才。人才的发现有一个过程，在关键时刻才能真正理解人才。”“既然人才难得又难知，就要爱惜人才，就要用人不疑。”

三

这两年来，周扬同志对发展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文艺批评工作，也讲了不少很重要的意见。他一贯主张建立具有中国民族特点的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主张创造性地运用和发展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反对教条主义。他说：“马克思主义理论建设要符合客观需要，符合客观真理，符合客观发展的必然趋势。若不然，就不是马克思主义。理论工作的任务，一是回答现实问题，一是说明历史问题。真正的理论，要能够解决现实问题，回答解决实际中提出的新问题，而且回答的准确、及时。我们说理论工作显得薄弱，文章没有说服力，就是还不能解决